

传播的理性与理性的传播

人们偏向全球传播起源于传播技术的事实，这使得传播思维乘着技术的翅膀，沉重而又轻盈。研究者一方面反思以技术作为权力资源的传播过程，呈现一种“恋物式反对”，即通过反对技术权力凸显其力量；另一方面在多学科视野中建构传播技术、话语技术和全球治理术，想象着技术与政治理性的传播通行无阻。

刚写下这段话，便收到《南方人物周刊》一位主笔的微信：有没有兴趣与最近爆火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对话？仿佛是人工智能来“敲门”，我欣然答应与这位搅得众生既兴奋又恐慌的机器人聊聊，感受一下人机对话的理性。

ChatGPT 摆出 AI 模型的“人设”，声明自己“不会有主观评价，只能根据事实来回答”。面对“人工智能是否会成为一种权力资源”的问题，它明确表示“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，可以使得一个组织或国家在竞争中取得优势，从而成为一种权力资源”。我进一步追问：“假如有人把你当作国际传播的权力资源，你会如何回应？”它直接劝告：“我希望他们使用我的技术和知识是遵守道德和法律规定的，不会对他人造成不利影响。”换一个角度问：“如果有人对你的使用符合法律但是不道德的，你会怎样？”它的回答很“技术”：“作为一种人工智能技术，我不具备道德观念和主观意识，所以不能独立评判是否不道德。”当话题转移到“人类在国际交流方面可以向你学习什么”，它的话语似乎活跃起来，认为人类可以从它这样的 AI 模型学到很多关于国际交流方面的东西，既谈到客观性、多样性的价值层面，也涉及及时性、实用性的工具层面。我明显感觉它因接受人给定的训练数据而表现了机器的人化，同时也因为引诱人沉溺于智能服务而显示了人的机器化，面对这一评价，它再次强调自己的 AI 模型“人设”：“我不具备感知或评价自己的能力。”当我感觉到对话的乏味，它很“程序”地回应道：“我乐于满足您的要求，请告诉我您希望我的回答有什么特别的语言风格或者内容，我将尽力实现。”我不得不请它向我提问，以便把对话进行下去，但这位聊天机器人还是死守自己的“人设”：我没有感情和情绪，所以不会对你有任何问题。

“对话”就这样止于“我不会对你有任何问题”，若要玩下去，只需领受其万能的“帮助”。显然，这个缺少感知和情感的 AI 模型正在制造人们对它的“智能”的单向需求，消解人们对自我的需求以及对人与人互动关系的需求。如果是这样，长久与它相伴的人就有可能在人机对话中失去对他者的需要，让他者消失，从而进入新的不成熟状态，套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：不被 AI 引导，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。到那时，也许再也不会再有启蒙运动，因为人们错把“智能”当“智慧”，失去了拯救自我的意识。这并非杞人忧天，有现实为证。ChatGPT 二个月便圈住 1 亿多用户，使其乐于放弃自主的智力劳动；而另一些计算 ChatGPT 将会夺走多少种工作的人，在恐慌中消解着自我的价值与意义。其实，真正的危险来自人本身，即人们在狂欢与痛苦过后自愿屈服于人工智能的理性控制。

此时，我们需要静下来体会真正属于人的“传播的理性”。按照法国启蒙思想家梅特里的说法，人是一架复杂的机器，心灵是推动人类机体运动的最主要的机括，也随着机体的健全和成熟而获得更多的智能，由此展现身心的完整性与多样性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人类创造智能机器人的过程既是身心延伸的过程，也是人与技术共生、丰富人类传播关系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传播的理性存在于把人类自我的完整性建立在与一切“思考着的智能存在者”的交往实践之中，而非担心智能机器人拥有自我意识后危害人类。它以关系理性协调智能存在者的理智与情感：不仅拥有语言与知识的加工智能，而且还生成情感智力和文化智力；不仅能感知他者，还能反思自我，在不同的语境中调节与他者的关系。由此，人类不断趋向与万物互联的完整的交流自我。

单波

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